



稱政治局)委員，直到一九八二年一月廿五日死亡時，均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是頗具影響力的長老。

另一人是庫拉科夫(Vladimir V. Kurakov)，他於一九六〇年起任斯塔夫羅波爾邊區黨委會第一書記，翌年蘇共第廿二屆大會當選中委。一九七〇年，庫拉科夫任蘇共中央書記主管農業，戈巴契夫即繼任邊區第一書記，年僅三十九歲。

戈巴契夫似乎是踏著庫拉科夫的脚印前進。一九七一年蘇共第廿四次大會時，戈巴契夫當選中委。同時，他也是一九七〇年第八屆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也就是說，七十年代起，他就擠進中央政治圈內。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他繼庫拉科夫任主管農業的中央書記。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升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八〇年十月再升任政治局最年輕的正式委員。

蘇斯洛夫任職斯塔夫羅波爾邊區時代，戈巴契夫還是孩提之輩。不過，從一九七四年起，戈巴契夫兼任蘇聯最高蘇維埃聯盟院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就得到蘇斯洛夫的賞識，蘇斯洛夫死後，戈曾繼任聯盟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因此，日人分析蘇共中央人脈時，常把戈巴契夫列入蘇斯洛夫一系。不過，作風上二人可大不相同。蘇斯洛夫主管思想理論頗為保守；主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中蘇共分裂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在他影響下的蘇聯外交頗為僵化。在這些方面，戈巴契夫就大有不同了。

一般說來，戈巴契夫是個得過多次勳章、獎章的年青有為的人物，當時蘇聯國內外很多人都持此種看法。

## 二

戈巴契夫是個改革派人物。事實上，當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接任蘇共總書記時，蘇共已是人事老化，政治僵化，經濟停滯，一般科技落後，外交陷入孤立，不改革就只有坐以待斃了。

戈巴契夫把他的改革稱為「重建」(Perestroika)，那象徵著改革幅度的廣闊，因此他說：「改革就是革命」。然而，實際上他是一個由上而下的體制內的改革者，不是一個由下而上的革命家。

戈巴契夫的「重建」，重心在經濟方面。一九八五年四月廿三日，他在中央全會報告關於召開蘇共廿七大及有關籌備和舉行廿七大的任務時，強調：必須把經濟集約化，加速科技進步，改善管理和計畫工作，改變結構和投資政策，提高組織性和紀律性，根本改變工作作風，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同月廿八日，蘇聯的「和平與進步」廣播電台播放他的報告時，就標題為「完善經濟制度」。一九八六年三月七日真理報刊載的蘇共廿七大通過的「蘇共綱領新版本」第一部分標題是「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現代的基本內涵」。可見他的經濟重建也是體制內改革。

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是不可能有效的。而在共黨一黨專政的國家，要政經改革成功，就不能缺少黨的改革。因此，戈巴契夫於一九八六年二月在蘇共廿七大的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

國家的實際工作，在一些年月裏落後於時代的要求，落後於生活本身的要求，這不僅是客觀原因，而首先是主觀原因造成的。在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日積月累遲遲不能解決，管理工作的形式和方法故步自封，工作速率下降，官僚主義滋長，這一切給我們的事業帶來了很大損失，社會與生活中起了停滯現象。形式和人要求變革。然而，中央機關以及地方機關裏有這麼一種思想佔了上風，就是用什麼辦法能够做到既改進了工作，又什麼都不變。同志們：這是不可能的。俗語說，「停下一步就落後百步」。問題成熟了，不解決是不行的。這種態度會使國家和黨付出巨大的代價。

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以俄文和英文同時在蘇聯和美國出版的戈氏名著**改革與新思維**<sup>①</sup>一書中，更進一步說：「沒有公開性，就沒有也不可能民主，而沒有民主，就沒有也不可能現代社會主義」。

這些話表示，爲了經濟改革，不能不連帶地從事黨、政和社會改革。

然而，在蘇聯這個共黨國家，整個體制構成一個「品」字形。下面的兩個「口」字，一個是公有經濟，一個是獨裁政治。上面一個「口」字是共產黨，它掌握著絕對權力，並且以意識形態的黏合劑，牢牢握緊整個「品」字的每一個角落。打個比喻，就如同蘇聯著名經濟學者雅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所說，政治和經濟就像腳踏車的兩只足蹬，只有一邊動，腳踏車是不會前進的。我們該加添著說，腳踏車的騎士該更重要，因爲前進的方向操諸他手，是奔向坦途還是跌進泥淖，就要看他了。

戈巴契夫了解到這一點，因此他又提出「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公開性」（Glasnost）、乃至「新思維」（New Thinking）等等，要將「品」字大廈全面翻修。可是這項工程過於浩大，計畫稍一不慎，執行稍有失誤，都會招致嚴重後果。可以說，戈巴契夫的「重建」，自始就是一場賭博。

## 二

戈巴契夫不是固執己見的死硬派，路走不通時他也會迂迴前進，如有必要，他也會讓步。從這方面看，毋寧說他是個現實主義者。

註① 戈著原名重建：對國家與世界的新思維（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中共譯名爲改革與新思維。

在經濟改革方面，戈巴契夫提出「加速」(Acceleration)戰略。可是，他是個社會主義者，最初仍牢抱著社會主義所有制——公有制與准公有的集體所有制。一九八六年二月，他在廿七大的政治報告中強調：

作為我們社會主義制度基礎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問題是十分重要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有豐富的內容，包括……。他在**革命與新思維**書中，一則說：「我們進行的一切改造都是符合社會主義抉擇的，我們是在社會主義的範圍之內，而不是在這個範圍之外去尋求對生活提出的問題的答案的」。再則說：「即使有人想把蘇聯拉向資本主義，這也是完全辦不到的」。三則說：「我們不想削弱中央的作用，否則就要失去計畫經濟的優越性」。<sup>②</sup>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個體勞動法」(翌年五月一日生效)，允許家庭手工業、大眾生活服務、社會文化活動三部門、二十九種行業，可由私人經營。一九八七年六月，通過「國家企業法」(翌年元旦施行)，目的在擴大企業自主權，包括獨立核算制、對資金調配、工資等級的自主裁量權等。過去的命令生產、國家訂貨等方式，則限制在機械工業的二十五%、輕工業的三十四%範圍以內。除國防產業外，預定一九八八年企業的六十%、一九八九年一百%都適用「國營企業法」。一九八七年一月決定實施「合辦企業法」，目的是在不增加對外債務的條件下，引進外國資金、技術、經營方式等。一九八八年五月又通過「蘇聯合作社法」，賦予合作社企業人事、經營、財務處理等廣泛的自主權，加強其私營的性格。並將合作社企業和國營企業同視為國民經濟的基本環節，畀予同等地位、法的權力與對外貿易權。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起，蘇共舉行為期四天的第十九次全蘇黨代表會議。<sup>③</sup>戈巴契夫曾呼籲讓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有人提出採用租賃承包制及在所有的企業裏貫徹實行新合作社法。一九八九年三月蘇共中央全會中，戈巴契夫再倡農業自由化。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戈氏在真理報發表長文，標題為「社會主義思想與革命性的『重建』」，已提出放棄民主集中制和大規模的計畫化。蘇聯最高蘇維埃也於同月開始討論「土地法案」，於一九九〇年二月三日三讀通過，使土地由國家所有改為地方蘇維埃支配與管理。有條件承認人民對土地有終身使用及繼承權。該法案於同年三月十五日生效。

一九九〇年三月六日，通過「所有制法」，定七月一日生效。規定所有制有三種形態，即：市民所有、社會(合資、集體)所有、國家所有，三者有同等地位，人民有權為維護財產而控告政府。該法使用「市民所有」而不使用「私有」字樣，是只承認部分生產資料可以私有。至於企業、工廠、大規模生產設備，個人尚不得擁有、經營。對於土地、天然資源、規定

註② 改革與新思維(中共，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二五、三〇、七四頁。

註③ 代表會議(Party conference)與代表大會(Party congress)有別，後者為黨內最高權力機構，為配合五年經濟與社會發展計畫，每五年召開一次。代表會議討論黨的基本政策與策略問題，可由各級黨部推派代表，過去常在兩屆代表大會之間舉行，共舉行十八次。一九五二年十月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決定，今後不再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有關黨的基本政策與策略問題，應即時由黨的代表大會審查。故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乃為首度恢復舉行。

「為該當地區居民的固有財產」，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在蘇聯範圍內「占有、利用、管理」。最高蘇維埃對該法的解釋是：(一)土地是國有財產；(二)土地屬於生活於其領域的國家；(三)個人有終生租賃土地及傳諸子孫之權。同年六月六日通過立法，給予私人工商業與國營企業同等的法律地位。六月十三日通過由中央計畫經濟轉型至市場經濟的計畫大綱。

一九九〇年七月二日至十二日，蘇共提前召開的第二十八次大會，在通過的「綱領聲明」中，明確的說要採行可以「調控」的市場經濟。此後領導階層對步入市場經濟的速度大起爭執，有總統委員會委員夏塔林(S. S. Shatalin)的五百天內過渡到市場經濟的計畫，有總理雷日科夫(N. I. Ryzhkov)的政府案和戈巴契夫的最終案。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各案內容儘管不同，却不見了「可以調控」「有計畫的」等字樣，而只談「市場經濟」了。這一演化過程，會使得保守派頭暈目眩，認為是從社會主義經濟節取退。

#### 四

如前所述，在蘇聯從事改革，必須經濟與政治同步進行。然而要改革真正有效，還得從黨改起。因為共黨高高在上，自稱為無產階級先鋒隊，後又改稱為「社會領導與指導力量，為政治制度、國家與社會組織之核心」(一九七七年憲法第六條)「它掌握著政治、經濟乃至整個社會一切物質和精神的權力，它不動其他的都動彈不得。戈巴契夫身為總書記，要改革共黨本身也是一場賭博，因為搞不好就會把自己的權力基礎挖空。

照大陸人士馮紹雷的說法，很難說戈巴契夫一上任就形成了全面改革的戰略思想。二十七小時，在政治方面，他只提到更新政治機關和意識形態機關的工作方法，加深社會主義民主，堅決消除保守主義，並沒有使用「政治體制改革」的提法。這種提法初見於一九八六年七月底他視察遠東期間，那時他的改革構想已明確表述為「它不僅涉及經濟領域，而且包括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如社會關係、政治體制、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黨和國家幹部的工作方法與作風等」。馮紹雷指出，決定性的變化，發生在一九八七年一月蘇共中央全會上。當時，戈氏表示：「經濟發展最終取決於政治民主化。」同年六月全會在作出有關經濟體制改革原則性決定的同時，決定在一年之後的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召開黨的第十九次代表會議，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和擴大社會民主問題。在這次代表會議上，戈氏提出：當前「改革的邏輯發展，決定要求進行政治改革」，不解決「這一關鍵問題」，經濟改革「將會停滯」，改革的「偉大創造性成果將會付之東流」。<sup>④</sup>

戈巴契夫深深了解，高度中央集權仍然牢牢地制約著經濟發展方向，而這個大「權」正是「集中」在黨的手裏。於是，

註④ 馮紹雷，「一九八八年的啟示——論蘇聯體制改革的特徵」，特區經濟（廣東深圳，一九八九年六月），一六—一八頁。

他就想把黨的權力轉移給政府。十九次代表會議的重要決定之一，就是黨政分離，改進黨及政治制度。

一九八八年九月蘇共中央全會，根據第十九次代表會議決議，決定取消中委會下屬的約十個部，另成立六個委員會，使黨僅作內外政策基本戰略和思想教育的指導，不再直接介入立法與行政。另一方面，同年十二月，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關於修改和補充蘇聯憲法的法律」，成立人民代表大會（Congress of USSR Peoples Deputies），由人代會選出具有議事功能的最高蘇維埃為常設機關，並由人代會選出最高蘇維埃主席，為具有實權的國家元首，兼有議長功能。一九八九年三月選舉，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戈巴契夫當選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這樣，權力由黨轉移給政府，並不影響戈巴契夫本人的權力。

一九八九年下半，很多東歐國家紛紛放棄憲法上規定的共黨專政地位，直到同年十二月，戈巴契夫仍然不肯步其後塵。可是，就在那一個月，立陶宛修改憲法要實行多黨制，立陶宛共黨也宣布脫離蘇共而獨立。跟著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也廢止共黨專政條文，格魯吉亞共黨也於同月宣布脫離蘇共。戈巴契夫不得已，才於一九九〇年初訪問波海國家時鬆了口氣。同年二月蘇共中央全會，根據戈巴契夫親口提議，通過放棄共黨專政及實行總統制的決定。三月十三日，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修改憲法第六條，廢止「法」定的共黨專政地位。十五日選舉戈巴契夫為蘇聯第一任總統，並於當天就職。

據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際政策委員會主席也是戈巴契夫高級顧問的雅科伏列夫（A. N. Yakovlev）說，早在兩年前蘇聯文學報和「社會體制世界經濟研究所」就有人提出實行總統制的主張，當時戈巴契夫以不符合蘇聯傳統而加以拒絕。及至新蘇維埃制施行成效不佳，黨仍未完全放權，他才於一九九〇年二月七日蘇共中央全會時自行提議實行總統制。全會通過的黨綱草案中，聲稱為確保國家穩定發展、加速重建，政府各機關在實施民主化過程中能維持正常運作，應設置民選總統並賦予強大之行政權力。並強調有確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制度及強化法院獨立性、保障社會法治之必要。戈巴契夫於同年三月十五日當選第一任總統，當即就職。

一九九〇年七月的蘇共二十八次，「黨政分開體制」才正式確立。戈巴契夫雖仍當選總書記，但新設一位副總書記，以便戈氏把精神專注在總統職務上。同時將國家大事的決策權由黨的中央政治局轉歸政府的總統委員會，而戈巴契夫改革派的菁英分子，也全部網羅到總統委員會，以前的「黨政融合體制」就此告終。

黨政關係如此重大變化，必然會涉及意識形態問題。在戈巴契夫二十七大的報告中，還在鼓吹馬列主義。大會決議，支持蘇共中央將馬列主義思想用於「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用馬列主義理論「積極闡明」現實生活。

一九八八年十月四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梅德維杰夫（V. A. Medvedev）就意識形態問題發表的講話中，就提出從質量上更新社會主義。他強調了市場的重要。又說在制訂社會主義前景和形成當代社會主義概念時不能脫離整個人

類的經驗，其中包括世界非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他仍然說，社會主義經濟沒有中央的強有力的作用是難以想像的。又說，要加強黨對社會過程的影響，但不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而是要通過集中黨的精神更深入地研究理論和政策，分析社會，用黨所具備的政治和思想手段影響輿論。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戈巴契夫在真理報發表「社會主義思想與革命的『重建』」一文，承認現今在我們面前恢復馬克思主義思想及其對現實的指導性權威，乃是困難的課題。他批評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自我發展能力，給予過小的評價。對列寧死後的蘇聯也多所批評，而且初次提出「人道的」社會主義。一九九〇年七月蘇共二十八次通過的綱領性聲明，就更清晰而明確的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 五

綜上所述，可知戈巴契夫的改革相當大膽，但事先缺少整體的一貫計畫。他仍是忠貞的共產黨員，緊抱著社會主義不放，但又不能不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逐步退讓。於是黨內派系林立，意識形態混亂；經濟一蹶不振，國民總生產呈現負成長，人民生活困苦萬狀，在民主化、公開性號召下，民族紛紛此落彼起，越發加深政治和經濟危機。

一切改革都會傷害到既得利益階層。略舉數例如左：

就黨內人士言，著名的保守派李嘉契夫（Ye. K. Ligachev）曾經指摘說，這個世間最寶貴的東西，莫過於蘇聯人民對未來的堅固信念，這才是社會主義的特質。現在，我們這種確信已大半喪失。國內的混亂，就是由於國家統制能力的弛緩。我們過去的一切，連同那些有益的東西，一起都給丟掉了。

列寧格勒省第一書記吉達斯波夫（B. V. Gidasov）說，國內情勢不安日增。我們檢討一下綱領聲明，沒有一絲光明的展望。黨失去了指導性。立法機關要制定法律時，從來不考慮會發生什麼影響。政治組織已被抽去筋骨，不能夠作出一件負責任的事。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六日，克里姆林宮召開有三、五〇〇位國營企業經營者參加的大會，一位來自愛沙尼亞的國營企業負責人說：「對於『重建』沒有任何概念，就從一九八五年開始，現今正陷入崩潰之途。」他的話被激怒的戈巴契夫一時打斷，全場騷然。但他還繼續說：「『重建』不是朝向建設的方向，而是朝向破壞的方向進行。」「對國家和人民的犯罪行為，正在進行中」。其他企業首長也紛紛發言，對『重建』加以抨擊。<sup>⑤</sup>

註⑤ 經濟新聞（日本），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八日，第九面。

軍方的不滿以及政變之說，更甚囂塵上。戈巴契夫的最高軍事顧問、蘇聯元帥阿赫羅梅耶夫（S. F. Akhromeyev）曾有廿名軍司令官連署的、類似最後通牒的手書遞交戈巴契夫，信中對於導致華約組織崩潰的戈巴契夫和謝瓦納澤（E. A. Shevardnadze）加以非難，他們代表軍方明確表示，對於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格魯吉亞、亞美尼亞、摩爾多瓦（前摩爾達維亞）、波羅的海三國，絕不能容許其離反。<sup>⑥</sup>

一時戈巴契夫身受左右夾擊，不少呼聲要求他辭職，尤其是若干共和國要求獨立，迫使他自一九九〇年後半即有「右傾」跡象。同年十二月最高蘇維埃通過憲法修正案，賦予總統更多權力，同時調整行政機構，在總統直接領導下，設立聯邦委員會、國家安全會議（為與KGB區別，故譯為會議）以及直屬總統的內閣，而取消總統委員會。總統的一些決定無需議會討論便可直接發布。

其次是加緊草擬醞釀已久的新聯盟條約，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廿四日交全民討論，十二月則不顧某些共和國的反對在蘇聯議會迅速通過。戈巴契夫強調，各共和國「必須在兩個月內簽署新聯盟條約」。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廿七日，蘇國防部長雅佐夫（D. T. Yazov）在與戈巴契夫會談後發表八點聲明，強調軍隊在受到攻擊時可使用武器。接著就向波羅的海三共和國派駐軍隊，制止民族分裂運動。

在人事方面，新設的副總統，提名曾經批判過向市場經濟過渡政策的蘇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亞納耶夫（Gennady Yanayev）出任，經兩次投票始行當選。提名保守的前財政部長帕伏洛夫（Valentin Pavlov）出任總理。以前拉脫維亞國安會（KGB）主席，曾經鎮壓自己同胞的民族主義運動的普戈（Boris Pugo）取代溫和的巴卡廷（Yatim Bakatin）為蘇聯內政部長。

此外，一九九〇年生效的新聞法突然停止執行，對新聞實行事實上的檢查。

種種強硬措施使日人驚呼「新沙皇」誕生。謝瓦納澤也警告說，蘇聯的「（保守派）獨裁危機」可能到來。他於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廿日辭去外長職務。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三日立陶宛發生「血染星期日」事件後，總統助理彼特拉科夫、總統經濟顧問夏塔林相繼去職。跟著總統首席顧問雅科伏列夫也離去。

平心而論，身為黨的總書記及國家總統的戈巴契夫，總要設法尋求黨的革新和維持聯盟的存在。他之未明白支持夏塔林五百天轉型至市場經濟的經改計畫，主要原因就是他所希望的計畫，能够符合乃至配合他所提出的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轉變為主權國家聯盟、也就是由一個高度集權的聯盟改為鬆散聯盟的構想。

註⑥ 梅德維杰夫（Zhores A. Medvedev），「蘇聯自我崩潰之路」，佐野真譯，經濟學人（日本），一九九一年九月廿四日號，八頁。

或許戈巴契夫想在保守派與革新派之間維持左右平衡，作為國家的領導人，這也不足為怪。只是他的親信紛紛離去，使他失去這個平衡，處於不利地位，革新派的親信也難免「臨陣脫逃」之嫌。

應當說明的是，儘管戈巴契夫有「右傾」跡象，但他並非對保守派言聽計從。譬如說，保守派要求在民族紛爭地區宣布進入非常時期或將該地區收歸總統直接統治，這都是憲法賦予總統的權力，但戈巴契夫始終不曾這樣作。對於波海國家的流血事件，戈巴契夫說並不知情，極可能是普戈的傑作，因為逞兇的黑扁帽部隊就隸屬內政部。

## 七

意識形態混亂，黨的權力削弱，黨的聲威也就跌至谷底。本來，在蘇聯只有一個政黨——共產黨。當年史達林解釋列寧的黨，其中有很重要的兩點是：

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黨是意志的統一，是和派別組織的存在不相容的⑦。

共黨第十次大會，更明白規定不許有派系組織。而今，共黨已放棄專政地位。一九九一年四月蘇共中央全會中，戈巴契夫公開承認，「蘇共內部已有三四個黨」。七月廿五日至廿六日的中央全會中，他又透露，近年退黨的蘇共黨員有四〇〇萬人，現只有一、五〇〇萬人⑧（廿七大時一、九〇〇萬人）。很多黨員（包括一些不滿的軍人）出賣黨證給美國遊客，每證價值二〇〇至三〇〇美元。⑨

七月全會討論通過了新黨綱草案的第八稿，它有幾項要點：（一）引進人道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那會使馬列主義成為裝飾用的具文；（二）實行議會民主主義，那樣，共產黨就由「前衛黨」變成普通政黨；（三）實行新的主權國家聯盟，那將使蘇聯由一個多民族的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變成為主權共和國的民主聯盟。換言之，舊的蘇聯已不復存在；（四）實行多種所有制形態的混合經濟，它是向市場經濟過渡而不是向共產主義過渡。這個綱領一俟預定年底召開的廿九大通過後即付諸實施。它將成為戈巴契夫所說的蘇共九十年代的行動綱領。於是，若干黨幹就憂心忡忡。

關於醞釀已久的新聯盟條約，於一九九一年四月廿三日，由戈巴契夫和包括葉爾欽在內的九個共和國領導人發表了「九

註⑦ 史達林，「論列寧主義基礎」，共產黨原始資料選輯第三集（台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政大東亞研究所，民國五十八年十月輯印），一三七、一三九頁。

註⑧ 唐脩哲，「沒有發生『聾人聽聞事件』的蘇共中央全會」，瞭望（中共），一九九一年八月五日號，四四、四五頁。

註⑨ 香港時報（香港），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九日，第二版。

加一「聯合聲明，主張簽署主權國家聯盟條約來取代一九二二年列寧領導下簽訂的聯盟條約。新條約於同年七月廿三至廿四日戈巴契夫與各共和國代表會談時已差不多取得最終合意。八月二日戈氏宣布新條約已準備簽署。這個條約案的內容是突出共和國的權力，而聯盟的權力則係由簽約的共和國所授予，那是說共和國權力優於聯盟權力。關於所有制問題規定，土地、礦產、水及其他天然資源乃共和國的財產，根據共和國法律加以利用。鑽石、黃金、石油、煤炭等可以換取外匯的資源為共和國所有。共和國對這些資源讓渡給聯盟，保有拒絕權。徵稅權屬於共和國，共和國根據與聯盟間的合意，將稅收之一定比率納繳聯盟。這樣，聯盟的財政能力有限，各項支出特別是軍費必須極力撙節。

這個新聯盟條約預定一九九一年八月廿日簽署，十九日政變爆發。

政變參加者是：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G. Yanayev）、國防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諾夫（O. D. Baklanov）、國安會（KGB）主席克留其巴夫（V. A. Kruchkov）、總理帕伏洛夫（V. C. Pavlov）、國防部長雅佐夫（D. T. Yazov）、內政部長普戈（B. K. Pugo）、蘇聯農民聯盟主席斯塔洛都切夫（V. A. Starodubtsev）、政府企業工業建設業運輸工程公會主席齊札柯夫（A. I. Tizyakov）。這是所謂八人執政團。此外，據說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魯吉揚諾夫（A. I. Lukyanov）是政變主謀者。甚至總統的幕僚長包爾丁（V. I. Boldin）也跑到政變這一邊。這些人大多原本不是保守派，而是戈巴契夫選擇的改革夥伴，魯吉揚諾夫且是戈氏大學時代起的知交。他們是被改革的幅度與速度嚇呆，爲了想保住舊的蘇共與蘇聯而出此下策。結果適得其反，政變加速了蘇共的死亡和蘇聯的瓦解。

## 八

戈巴契夫在政變期間表現不凡。他寧願自殺也不在政變者提出的文件上簽字，那就使得政變者所謂戈氏因「健康」理由不能視事，由副總統亞納耶夫代行其職務的說詞成爲謊言，使企圖「合法」接收政權者變爲「非法」。政變於三天後失敗，戈巴契夫並未採用共黨國家慣用的大量報復手段，僅對政變者依法處理。

他依然想挽救蘇共和蘇聯。政變後他返回莫斯科，於一九九一年八月廿三日在俄羅斯共和國最高蘇維埃演說，猶在呼籲人民不可陷入反共的歇斯底里。可是，蘇共中央在政變中表現不佳，而政變者又全體都是中央委員，使他不能不作處理。終於廿四日辭去總書記職務，建議中央委員會自行解散，凍結蘇共財產，使各級地方黨部自行決定其去向。不過，他還希望有良知的共產黨員重結新黨。

政變後戈巴契夫仍致力於新聯盟、經濟共同體等等的締結，以圖挽救蘇聯不致瓦解。然而時不我予，同年十二月八日，

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宣布成立獨立國家共同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其他共和國也陸續加入。這個共同體並未完全包括過去的十五個共和國，性質上也不是一個統一國家。換言之，舊的蘇聯已不復存在，戈巴契夫成爲沒有國家的總統，他就於台北時間廿六日凌晨三點辭職。

身爲總書記弄得共黨消亡，身爲總統弄得國家瓦解，從這方面看來，他豈不是罪人？然而，把蘇聯衆多民族、兩億多人口從共黨暴力統治下解放出來，使他們呼吸到民主、自由的空氣，豈不又是一大功績？

戈巴契夫是個失敗者，但他的失敗不應完全由他個人負責。幾十年的共黨體制已走到盡頭，大廈將傾，不是一個人能夠獨力支撐得了的。也許葉爾欽說得對：

戈巴契夫的改革案，一會兒用右手寫，一會兒用左手寫，歸根到柢就是妥協。<sup>⑩</sup>

妥協或許是他總書記和總統的職務使然。不過，葉爾欽還有一句一針見血的話，他說，戈巴契夫的失敗，是由於他死抱着共產主義不放。真的，「死馬」是醫不活的。

戈巴契夫是個身受過諾貝爾和平獎金、國際聲望極高而在國內遭受冷遇的人。然而，他那辭職演說是值得拍案讚賞的，特別是下面幾句話：

由於意識形態掛帥，並承擔不斷向外擴張的軍事化的可怕負擔，已超出可能忍受的極限。我深信一九八五年春進行的民主改革在歷史上而言是正確的。

社會已經開放，政治與思想都獲自由，這是主要的成就，但其成果却未能得見，也許是我們尚未學會如何運用它的緣故。<sup>⑪</sup>

戈巴契夫在寫給雷根的信中，說他一直在想，過去他完成了些什麼事。他寫道：

這幾年來，我們把全球分裂成對抗陣營的情況克服了，把各國人民的距離拉近了。<sup>⑫</sup>

這些都是了不起的功勳，特別是對一個喝共產主義奶水長大、從學生時代就幹黨團工作的人而言，尤其如此。

當家人是污水缸，戈巴契夫在台上，全國上下一切困難、一切過錯，他都得承當。如今，他無官一身輕。其他各共和國的領導人，是否都勝過他？獨立國家共同體的前途如何？都還是未知數。戈巴契夫這個學歷、經歷都不錯的俄羅斯人，其政治生活是否就此終結？也可能是一個未知數。

註⑩ 新聞週刊（日本），一九九〇年二月廿二日，一一頁。

註⑪ 聯合晚報，民國八十年十二月廿六日，第六版。

註⑫ 香港時報，一九九二年一月五日，第二版。